

转型时期伦敦的移民文化及其建设 ——兼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

邓云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16-17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伦敦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城市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问题。伦敦外来移民以青少年为主,酒馆文化是移民文化的典型形式。酒馆文化带有睦邻社区文化的性质,主要是一个民间和社区过程,在青少年移民中建立起社会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移民的自我调适,但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解释,成为精英阶层推行习俗改革、削弱睦邻社区的“根据”,社会问题治理的失效,体现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持续张力。

关键词 城市社区 社会转型 移民文化 伦敦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0)01-0073-03

自中世纪开始,伦敦在英国的地位就非常显赫。作为一国之都,它不仅是王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王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16世纪末,一位英国观察家普拉特在谈到伦敦的这种显赫地位时说:“人们不是说伦敦在英国,而是说英国在伦敦。”^{[1]315}而且,伦敦的这种中心地位与日俱增。这主要是由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和与之相应的城市地域与经济扩张所致。伦敦仅仅花了150年的时间,其人口就增长6倍多,从1550年的7.5万人增长到1700年的57.5万人,人口增长之迅猛是前所未有的。^{[1]316}更甚的是,由于伦敦人口死亡率很高,超过了出生率,同期伦敦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因此,伦敦人口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外来人口的迁入。根据教会登记册对出生、结婚与死亡的记录等资料统计,1550-1599年伦敦的净移民数为18.7万人,年均3740人;1600-1649年净移民数为

30.3万人,年均6060人;1650-1699年净移民数为58.4万人,年均11680人。^{[2]168}据东恩德兹的一个样本统计,1580-1640年非伦敦出生者占87%;同期一个更大的样本是78%。^{[1]318}毋庸置疑,16-17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3]161}

外来移民基本属于平民大众,进入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受伦敦都市文化的浸染,备受伦敦精英文化的冲击;反过来,他们对伦敦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他们在部分接受伦敦都市文化的同时,也移入并创造了有别于都市文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为“移民文化”。移民文化无疑属于大众文化。16-17世纪是英国文化冲突比较激烈的时期。^{[4]497-498}本文拟通过伦敦移民文化形成与功能的考察,初步认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张力,理解伦敦以至英国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

收稿日期 2009-09-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的英国城市社区研究——以伦敦为重点》,项目批准号07JC770005)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邓云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英国史。

一、青少年与伦敦移民文化的形成

伦敦外来移民主要包括学徒、仆役、雇工、流浪汉等。学徒与仆役处于社会中下层,作为自由民家庭的附属成员,又称“依附劳动者”(dependent labourer),是伦敦外来移民的主体。学徒基本是男性,从16世纪中叶开始,伦敦行会和同业公会大量招收学徒,吸引很多年轻男子迁移到伦敦。仆役主要是女性,通常做家仆,从16世纪后期开始,伦敦富裕人家快速增长,家仆的需求强劲,吸引大批年轻女子迁移到伦敦。雇工与流浪汉处于社会最下层,又称“无主之人”(masterless man)。雇工是伦敦的辍镐大军,以建筑工与搬运工为主。流浪汉以乞丐为主,一边乞食一边流浪,在饥馑年代往往颇成规模。

就年龄结构而言,伦敦外来移民以青少年为主。学徒与仆役的年龄都不大,一般在25岁以下。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早期,二者所占伦敦人口的比例一直在1/3以上,一度还超过1/2,1540-1600年为53.2%,1601-1640年为39.1%。17世纪晚期,二者所占伦敦人口的比例仍维持在1/4左右,1641-1700年为22.8%。^{[5]154}学徒人数少于仆役,二者比例通常维持在1:2左右。至于二者所占伦敦外来移民的比例,估计在1/2上下,最高可达2/3。雇工与流浪汉大多数亦属于青少年。根据1602年布赖德威尔感化院被监禁者名单,流浪汉中21岁以下者占97%。^{[6]36}雇工与流浪汉所占伦敦人口的比例估计为1/6左右,所占伦敦外来移民的比例估计为1/5左右。可以笼统地说,1550-1650年伦敦外来移民年龄低于25岁者的比例为90%左右。根据上文的结论,该时期外来移民在伦敦人口中的比例应该不低于70%。如此,伦敦青少年移民所占伦敦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低于63%。在外来移民内部,90%足以形成“青少年文化”(youth culture),即使在整个伦敦,63%也足以让“青少年文化”成为一个严重的存在。

这些青少年移民不仅年轻,而且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单身。当时英国人实行晚婚,在事业无成之前一般不谈婚论嫁,伦敦市政议会也在一段时间内将婚龄限定在24岁及其以上。^{[7]273}事实上,外来移民的初婚年龄大都高于24岁。原有亲情与家庭联系已名存实亡,而现有的家庭关系一时又建不起来,这些单身年轻移民为了寻求文化与心理互慰,便在同龄人之间结成不固定的社会关系。

年轻、单身,一并构成“青少年文化”的纽带,共同导致伦敦移民文化的诸多特点。

这些青少年移民移入伦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求生存图发展,从乡村那种贫困与依附状态中摆脱出来,或者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过上相对富足、相对独立的生活。伦敦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发展潜力,以及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空间,为他们提供了机遇与可能性。然而,伦敦并不是所有移民的乐园。在这座陌生城市中,外来移民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与困难,面临着竞争与失业的压力,有一个文化与心理调适的过程,有一个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行为方式,乃至不同语言与方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对于既缺乏社会经验又无家庭依托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过程更加具有挑战性。酒馆,一个近代早期英国盛行的大众文化载体,很快成为联结青少年移民的基本场所。

二、伦敦酒馆文化的功能与利弊

酒馆主要提供餐饮,有的也提供住宿,为外来移民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食宿与聚会之所。酒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供啤酒的啤酒馆(ale-house),另一种是既供啤酒又供饭菜的酒菜馆(tavern)。此外,还有一种为临时寄住者提供食宿的小旅馆(inn),也提供酒水。^{[8]197}这些酒馆价位适中,大受手头并不宽裕的年轻移民的欢迎。而且,啤酒可以使不顺心的年轻移民暂时忘却烦恼,时人称其能“抚慰沉重忧虑的心……它使饥者饱,寒者暖”。^{[9]25}不仅如此,在酒馆里,年轻人可以找到与自己经历和文化层次相仿、有着相同境遇和相似心理困惑的人。他们可以在一起聊天谈心,娱乐消遣,交接朋友,寻得社会归属感。很多酒馆与某郡移民有较为固定的联系。有研究发现,17世纪初,来自同郡的移民往往在某个酒馆经常聚会,结成俱乐部,特别是在移民刚来伦敦的时候。^{[10]21}

酒馆逐渐成为都市年轻移民的主要社交场所。有资料表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伦敦酒馆蓬勃发展,数量迅速攀升。到1633年为止,在市政府辖区已有211家酒菜馆。^{[8]197}在17世纪中叶,在富裕的城内堂区每30至40户人家拥有一家酒馆;在移民集中的墙外堂区酒馆更为普遍,每6户人家就拥有一家酒馆。^{[10]22}在酒馆里,有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和消遣方式,打扑克、掷骰子、掷木盘、玩滚木等游戏往往与赌博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啤酒馆

身兼三任,在提供酒食与赌场赌具的同时,也暗中提供性服务,主要满足单身移民如学徒的性需要,他们一般要完成学徒期,24岁之后才能结婚。啤酒馆内的女服务员有兼事性服务的嫌疑。年轻女子进入伦敦主要做家仆。由于就业不充分,即使是善良有操守的女仆姑娘,也有被迫从事性交易而沦为卖淫女的高道德风险。^{[11]478}在17世纪前期的一段时间里,家内服务业萎缩,女子就业机会减少,啤酒馆为这些女子提供了一个就业和安身之所。由于就业竞争的残酷性和糊口的需要,很多未婚女子被迫卖身。这种双重生活也是一些在困难时期失业的妇女或未婚妈妈的一种别无办法的办法。萨瑟克行政当局曾注意到女性贫民、未婚妈妈与卖淫女之间的联系。^{[10]22}

不仅如此,烟馆的色情化也很严重。很多烟馆在售烟卖酒的同时,也从事性服务。烟馆用烟枪作为标记,但烟枪更像是幌子。事实上,这些烟馆就是妓院,烟枪反而沦为低级妓院的标志。烟、酒、妓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在时人眼中是无疑义的。1614年,一名鞋匠称,伦敦最赚钱的行当是啤酒馆老板、烟馆老板和妓院老板。^{[8]196}为生计所迫,还有少数女性移民沦为职业化的妓女。伦敦妓院的数量很大,遍布伦敦城内外,在东墙外特别是河岸最为密集,有“河岸妓院区”之称。妓院是经官方许可的,他们认为妓院为男子性需要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排遣渠道。这些妓院,与啤酒馆和烟馆一起,公共“创造”了伦敦的“性亚文化”(eroticsub-culture)。

总之,酒馆为外来移民特别是单身年轻移民提供了一个寻求文化心理互慰的场所,但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酗酒、赌博和暗娼的普遍存在,不仅有违社会道德与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而且造成诸如打架斗殴、梅毒蔓延等社会问题。

三、精英阶层的反响与文化冲突

酒馆特别是啤酒馆的快速增长,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引起了精英阶层的严重关注。1616年,国王詹姆斯一世在星室法庭的著名演说中抱怨英国“啤酒馆泛滥”,它们是“堕落的流浪汉,无业游民和身强力壮的懒汉的出没之处和栖身之地”,他要求“关闭所有有恶名的啤酒馆”。^{[9]23}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认为,酗酒是贪食贪饮、缺乏节制的代名词,是心地不正、懒惰的表现,是缺乏家庭责任感、处事能力

差的反映。^{[9]31}清教牧师阿瑟·登特引用《圣经》,认为奸淫与酒会夺去人的心,一旦失去理性,空有躯壳的人会犯下种种罪孽。^{[9]27}

16-17世纪英国的酒馆有着多方面功能,其数量快速增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什么时人对这一现象极为忧虑?这与精英阶层特别是政治精英对社会秩序的担忧有关。的确,酒馆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打架斗殴是酒馆里经常发生的事情,酒馆还是性交易和梅毒的温床。不过,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的深层担忧还与清教主导的城市习俗改革有关。16世纪后期,清教逐渐在英国兴起,提倡节俭寡欲,反对奢侈与纵欲,发起习俗改革运动,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方方面面,如禁止赌博,反对酗酒,加强性道德,改造流浪汉等,目的就是要强化基督教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控制和规范。^{[9]26-27}在清教看来,禁止赌博、酗酒、嫖娼与流浪,不仅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因酗酒、赌博、暗娼的经常发生,酒馆自然是清教习俗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伦敦是清教的重要基地,带头实施清教伦理,推行习俗改革。为了控制和规范酒馆的发展,伦敦对其实行许可证制度。不过,实施效果实在差强人意。1590-1642年,在伦敦城内只有40家酒馆取得经营许可证。1626年,140家小旅馆中只有30家取得小旅馆公会(Innholder's Company)的开业许可。^{[8]197}如此,有经营许可证的酒馆不足20%。大多数酒馆处于地下状态,公共机构无从有效管理,更难谈得上改造,赌博与性交易屡禁不止,以致1616年王室法令要求伦敦市政府彻查小旅馆和滚木胡同。^{[8]388}酒馆文化的这种地下状态表明,伦敦移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是显著存在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张力是长期存在的,精英阶层和公共机构在规范和推进移民文化建设方面的建树并不多,移民文化建设主要是一个民间过程。

在冲突和张力面前,移民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伦敦外来移民基本来自乡村,在传统文化中长大。当时英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睦邻社区文化”,弘扬邻人之爱,鼓励集体活动。当这些从小就熟知传统文化的年轻人移入大都市之后,他们仍然需要一个集体空间,需要一个有效的文化心理互慰手段。他们选择了酒馆。这样,酒馆就带有睦邻社区的性质。不过,睦邻社区的(下转第89页)

- [3]王先谦. 十一朝东华录[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3.
- [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 [5]魏源. 圣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李星龄. 春坡堂日录[M]. 转载自(朝鲜)李肯翊. 燃藜室记述选编[M]. 孙方明等.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一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 [7]正黄旗汉军世职谱档(袭字第 31 号)[M]. 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转引自黄一农. 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J]. 历史研究, 2004(4).
- [8]卫匡国. 清代西人见闻录: 鞑鞑战纪[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9]清世祖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清朝通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11]天聪朝臣工奏议[M]. 鲍承先等议考察启心郎优劣奏. 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 1980.
- [12]昭槎. 嘯亭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 [14]王思治.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5]李元度. 清先正事略选[M]. 台北: 大通书局, 1984.

(上接第 75 页) 集体主义性质引起新教特别是清教的严重不安。清教具有宗教个人主义倾向, 虽然并不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但更强调它的精神价值, 而非社会性。^{[9]28-29} 清教对酒馆所扮演的睦邻社区角色的批评, 也是新兴的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特别是市民阶层所需要的, 他们早就试图打破基于集体主义的“道义经济”, 建立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正好借习俗改革, 一并打击睦邻社区文化。为了实现习俗改革的“理想”, 为了削弱睦邻社区观念, 精英阶层包括市民阶层需要树立一个文化改造的对象。在移民城市伦敦, 移民大众及其聚集地酒馆, 就成为文化改造的最佳选择之一。不过, 对于移民的生存状态, 对于酒馆存在的合理性, 精英阶层并不关心。这就决定了精英阶层的改革无法获得移民大众的认同, 最终免不了“雷大雨小”的结局。也许, 精英阶层关注的并不是

改革的效果, 而是改革“理想”。转型时期的文化习俗改革, 主要停留在理想和宣传层面。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的发展, 主要是一个民间和社区过程。

综上所述, 16-17 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伦敦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事关首都的整体发展, 是城市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问题。伦敦外来移民以青少年为主, 酒馆文化是移民文化的典型形式。酒馆文化带有睦邻社区文化的性质, 主要是一个民间和社区过程, 在青少年移民中建立起社会归属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移民的自我调适, 但也带来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梅毒蔓延等社会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解释, 成为精英阶层推行习俗改革、削弱睦邻社区的“根据”; 社会问题治理的失效, 体现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持续张力。

参考文献:

- [1]P. Clark.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E. A. Wrigley,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邓云清. 转型期的伦敦移民问题与政府治理[J]. 理论月刊, 2006(4).
- [4]邓云清. 大众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 人文论丛, 2001.
- [5]A. L. Beier. *Engine of Manufacture: the Trades of London* [C]//A. L. Beier, R. Finlay.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 London: Longman, 1986.
- [6]尹虹. 16 世纪和 17 世纪前期英国的流民问题[J]. 世界历史, 2001(4).
- [7]L. Manley. *London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an Anthology*[M].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8]C. Bridenbaugh. *Vexed and Troubled Englishmen, 1590-1642*[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9]向荣. 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J]. 世界历史, 2005(5).
- [10]A. L. Beier, R. Finla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tropolis*[A]. A. L. Beier, R. Finlay.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C]. London: Longman, 1986.
- [11]F. M. L. Thompso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Vol. 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